

中国 建筑 60 年(1949-2009): 历史纵览

邹德侬 王明贤 张向炜 著

Sixty Year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1949-2009): A General Survey of
Its History

Zou Denong Wang Mingxian Zhang Xiangwei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中国建筑 60 年 (1949 – 2009) : 历史纵览

Sixty Year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1949 – 2009) :
A General Survey of Its History

邹德侗 王明贤 张向炜 著
Zou Denong Wang Mingxian Zhang Xiangwei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建筑 60 年 (1949 - 2009): 历史纵览/邹德侬, 王明贤, 张向炜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112 - 11357 - 6

I. 中… II. ①邹…②王…③张… III. 建筑业 - 工业史 - 中国 -
1949 - 2009 IV. F42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0279 号

责任编辑: 王莉慧 徐 冉

责任校对: 袁艳玲 陈晶晶

中国建筑 60 年 (1949 - 2009):

历史纵览

Sixty Year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1949 - 2009):

A General Survey of Its History

邹德侬 王明贤 张向炜 著

Zou Denong Wang Mingxian Zhang Xiangwei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印张: 23 1/4 字数: 600 千字

2009 年 10 月第一版 200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66.00 元

ISBN 978 - 7 - 112 - 11357 - 6

(1859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一个时代的社会变革，一个甲子的建筑进步 ——纪念中国建筑 60 年（1949 - 2009）^[1]

邹德侬

2009，令人心潮澎湃的年头。改革开放 30 年，共和国成立 60 年，引人回顾既往，前瞻未来。中国建筑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镜子，社会发展顺利，建筑进步迅速；社会发展坎坷，建筑举步维艰。60 年间，包括建筑师在内的广大中国建筑人，在艰难的条件下，用智慧、勤劳和汗水，创建了辉煌壮丽的建筑作品，也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中国建筑 60 年的前 30 年，在与外界基本隔绝的状态下，按计划经济的轨道运行；后 30 年，逐渐融入国际大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占有重要一席。这里，从 60 年编年史选取若干话题，回顾我国建筑在这个“甲子”中的进步和经验教训，为建筑进入新的年代提供参照。

1949 年，新中国大地上还弥漫着战火余烟，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就拉开了恢复国民经济的沉重帷幕。八年抗战加三年内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罹难同胞无数，财产损失无算；城市残破，经济败落，农村凋敝，人民贫寒，原本比较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几近崩溃的边沿——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现状，也是新中国建筑的起步环境。

一、自然延续，走向现代建筑的新起点

从 1949 到 1952 年，是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经济领域，主要任务是恢复交通、开展工业生产和改善人们生活。这个时期，建设项目不多，投资规模不大，但要求速度快，在建筑中，出现了一批后来被贬称“方盒子”的经典现代建筑。所谓经典现代建筑，是欧美进入工业社会后出现的新建筑，它结构先进、造型简洁且施工方便、经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解决住房问题方面起到重要作用。1949 年前毕业的许多建筑师，有欧美留学的经历，受教育期间正值经典现代建筑发展与成熟时期，他们不失时机地学习或认同现代建筑原则，并参与实践，为战后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积累了能量。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建设环境，为延续现代建筑提供了可能：一，亟待建设涉及人民生活的建筑，但财力、物力有限，而经济和简洁等原则，天然符合这类需求；二，政府未及正式确立建筑方针，从军队转入地方的干部，大体上尊重建筑师及其设计，较少进行“行政干预”，建筑师有一个相对自主的创作环境。由于中国建筑师的战前积累，他们自觉地将现代建筑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因而留下第一批优秀中国现代建筑作品。

这些建筑一般为三四层简洁朴实的“方盒子”，有些建筑带有中国纹饰，分布较广，类型也多，学校建筑如上海同济大学文远楼（1951～1953，黄毓麟、哈雄文等设计）、广州中山医学院生物楼（1953，夏昌世设计）、长沙湖南大学工程馆（1953，柳士英设计）、大连医学院教学楼（1950年代初，汪坦设计）等。医院建筑如武汉医学院医院（1952～1955，冯纪忠设计）、北京儿童医院（1952～1954，华揽洪、傅义通等设计）、青岛纺织管理局医院（1950年代初，上海华东设计院设计）等。礼堂建筑如武汉洪山礼堂（1950年代初，周立模设计）、杭州人民大会堂（1951，唐葆亨设计）。军政办公建筑如北京军委西郊军训部办公楼（1952～1953，陈登鳌、徐学文设计）、北京西郊总后军训部办公楼（1953～，龚德顺设计）、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大楼（1952～，吴景祥设计）、兰州军区后勤办公楼（1950年代初）、武汉军区司令部办公楼（1950年代初）等。其他如北京和平宾馆（1951～1953，杨廷宝设计），广州文化公园的展览建筑等（1951～，林克明，夏昌世等设计）。上海曹杨新村是我国居住区规划建设的开创性作品（1951，汪定曾等设计），规划运用了国际上比较通行的“花园城市”原理，充分考虑地段内的自然地形，建筑自由布局，创造了一个环境优美宜人的居住区。

这是新中国新建筑十分有意义的开端，不幸的是，这批建筑不久即遭到来自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建筑理论”的严厉批判。

二、民族形式，歌颂人民胜利的纪念碑

胜利完成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以后，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中心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苏联援助的156个工业建设项目。大批苏联专家来华，不仅带来了设计、资金和设备，也带来了曾在苏联本土流行的所谓社会主义建筑理论。当时执行“一边倒”、“向苏联学习”政策，全盘接受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为核心这套理论。这两个口号，本是斯大林为整肃苏联国内现代主义文艺倾向提出来的，对于广大中国建筑师而言，那是十分陌生的理论：源头不清，内容不明。然而，他们能够强烈感受到的是：一，严厉批判欧美的“方盒子”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建筑，是帝国主义企图消灭各国民族文化的工具；二，苏联建筑的“民族形式”，就是俄罗斯古典建筑形式。建筑家梁思成对该理论作了“中国化”的解释，推出了以传统宫殿式建筑为蓝本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

许多建筑师接受民族形式建筑，还有其内在原因。百年屈辱，中华民族丧权辱国；连年战争，中国人民期盼重整山河。在这革命胜利并展开第一个五年计划之际，以传统古典建筑为蓝本的民族形式建筑，代表了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赞颂革命胜利的纪念碑。确切地说，这一时期的民族形式建筑，并非全然复古。建筑的功能、结构、设备甚至基本体量的处理都是现代的，其民族形式主要体现在宫殿式屋顶及其相关装饰上。传统的建筑屋顶，巍峨壮丽、曲线优美，但其构造和装饰，与现代结构、材料、功能乃至经济之间的矛盾，也是显而易见的，早在1949年之前，就引发过争论。

民族形式的建筑作品丰富多彩。第一是中国宫殿式，如北京四部一会办公楼

(1952~1955, 张开济等设计)、北京地安门机关宿舍大楼(1954, 陈登鳌等设计)、北京友谊宾馆(1953~1954, 张镈设计)、长春地质宫(1954, 王辅臣等设计)、南京大学东南楼和南京华东航空学院教学楼(1953~, 杨廷宝设计)、兰州西北民族学院教学楼(1954, 阳世缪设计)、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和礼堂(1955, 柳士英设计)等。第二是少数民族式, 运用新疆地区伊斯兰风格的圆顶、尖拱, 内蒙地区蒙古包式圆顶, 它们令人耳目一新, 丰富了中国民族大家庭的建筑文化。实例如北京伊斯兰教经学院(1957, 赵冬日、朱兆雪设计)、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剧场(1956, 刘禾田、周曾祚设计)、乌鲁木齐人民电影院(1955, 新疆建设兵团设计处设计)、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陵(1955, 郭蕴诚设计)等。第三是民间地域式, 许多不赞成宫殿式方向的建筑师, 把眼光投向民居, 寻求民族形式灵感, 其建筑更为朴实、亲切。如北京外贸部办公楼(1952~1954, 徐中设计)、上海鲁迅纪念馆(1956, 陈植、汪定曾、张志模等设计)、上海同济大学教工俱乐部(1957, 王吉鑫、李德华设计)。爱国华侨陈嘉庚等设计的厦门大学建南大会堂(1950~1954, 陈嘉庚、刘建寅设计)、南薰楼和集美学校等, 不仅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 而且体现了不拘一格的华侨建筑文化。第四是摆脱“大屋顶”的探新, 基本上按照现代建筑的原则设计, 有节制地增加一些传统的装饰, 是探索中国现代建筑的再起步。如北京建筑工程部大楼(1955~1957, 龚德顺设计)、北京电报大楼(1955~1957, 林乐义设计)、北京天文馆(1956~1957, 张开济设计)等。

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过程中的浪费现象, 使得建设资金难以为继, 其中包括因贯彻“民族形式”造成的花费。政府采取了极为严厉的反浪费措施, 对建筑标准的一降再降, 以至压到不合理的程度, 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同时, “民族形式”被批为“复古主义”, 并以报刊、电影广为宣传。梁思成被指为“复古主义”的始作俑者, 而真正推出“民族形式”的苏联建筑理论及其推动者, 却长期游离于批判的焦点之外。

三、十年总结, 十大建筑和建筑的双革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一年胜利完成, 在鼓舞建设热情的同时, 也助长了高层领导贪多、求快、高指标、大计划的冒进倾向, 最终酿成了1958年的“大跃进”, 一个用政治运动方式搞经济建设以及“全民大炼钢铁”的狂潮。“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 “技术革新, 技术革命”(即“双革”), 是这个运动的中心号召。建筑与其他领域一样, 也出现过许多脱离实际、求快求新甚至几近荒唐的事物。但是, 广大建筑工作者也确实满怀豪情、干劲冲天, 创造了中国现代建筑史中值得骄傲的篇章, 如建国十周年的北京十大建筑以及建筑结构技术带动建筑创作进步等。

从1958年9月6日到1959年的9月, 这短短的一年内, 从设计到施工, 全部完成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迎宾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10月完工)共十座建筑(原先计划有国家大剧院、科技馆等), 总面积达67.3万平方米。这是一个建筑设计的群众运动——参加设计的包括北京34个设计单位、各地专家30多位,

共同创作，对各项工程先后提出了400个方案，其中仅人民大会堂就提出了84个平面方案和189份立面方案。这是一个建筑施工的群众运动——面对工期如此短暂、规模空前巨大、技术难点众多的艰巨任务，建设者们“打破常规”，“苦干加巧干”，在举国支持下，如期完成任务，可以说是革命意志创造建筑历史的过程。这是一个包容多种建筑风格的小“百花齐放”——有使用大型薄壳先进结构结合传统的北京站，有采取预制装配先进结构的民族饭店，有类似西洋古典柱式结合中国传统建筑创新的人大会堂和对面的博物馆，有刚刚被批判过的“大屋顶”建筑——全国农展馆和民族文化宫，甚至还有带有苏式尖顶的军事博物馆……当然，在政治运动的气氛下，要完成如此困难的任务，势必打乱行之有效的基建规章制度，“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也酿成许多浪费现象和安全问题。无论如何，它们代表了建筑十年的最高成就，又是建筑十年的总结和纪念碑。

1958年前后，世界各国基本完成了战后恢复和重建，先后进入了新的大发展时期，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经济建设的奇迹。中国的“大跃进”恰恰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与国际求新求变的潮流相当吻合。许多中国建筑工作者，在“双革”口号的鼓舞下，虽与外界基本隔绝，但科学精神不泯，倾心开发新结构、探索新形式：一是建筑标准化与装配化；二是薄壳结构建筑；三是悬索结构建筑；四是新结构的构筑物。主要实例有，重庆山城宽银幕电影院（1958~1960，黄忠恕、吴德基、梁鼎森等设计；1998年拆除）的跨度30米的钢筋混凝土筒壳屋盖；上海同济大学学生饭厅（1961，黄家骅设计）外跨54米的钢筋混凝土联方网架屋盖；北京工人体育馆（1959~1961，熊明、孙秉源等设计）直径94米的圆形双层悬索结构屋盖；新疆乌鲁木齐建筑机械金工车间（1960，解放军新疆建筑工程第一师设计院设计）的60米直径椭圆旋转曲面薄壳屋盖。稍后的有成都双流机场航站楼（1960~1961，西南工业建筑设计院和四川省建筑设计院设计）的钢筋混凝土筒形薄壳屋盖，杭州浙江省人民体育馆（1965~1969，唐葆亨、沈济黄、宋德生等设计）125.24米×103.8米的鞍形预应力钢筋悬索结构屋盖等。此类建筑的意义，远远超过事情本身，它是中国建筑经历十年曲折道路之后的一个有希望的方向，甚至本应成为中国现代建筑的一个新起点。可惜，未来数年国内经济形势，无力支持这一方向。

四、三个视角，对文革建筑作正面观察

十年“文革”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正常的建设基本停顿，全国的设计单位也陷于瘫痪。广大的设计工作者，特别是资深的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了冲击。十年运动，时紧时松。为了政治形势的需要或一些最急需的经济活动，促使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和地域，展开了必要的建筑活动。在全局倒退的形势下，局部有所发展，可以从三个视角作正面观察。

第一，政治性建筑。所谓政治性建筑，一是建筑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斗争”，二是让建筑设计表现具体政治内容。常见的有两种方法：一是形象的明喻，借助向日葵、镰刀斧头、红五星等图案或符号，借助绘画、雕塑等媒介，宣示具

体政治内容。二是数字的暗喻，用特定有政治含义的数字，来确定建筑的体量、局部、构件或细部的尺寸，力图将政治含义包含在建筑之中。但是，建筑表现政治思想的能力十分有限，特别是用数字暗喻的方法，极不容易为观者所体认。此类建筑如成都四川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1969），用四根柱子将体量分为三段，寓意“三忠于，四无限”，用五步和七步台阶寓意“五七道路”等。位于广东农民讲习所旧址旁的广州广东展览馆，在建筑主体中部塔楼上设五个火把，把围墙、路灯设无数火把造型，象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在长沙等革命发源地，也有多种此类建筑出现。

第二，领域性建筑。十年文革，有些特定领域或建筑类型，如体育、外事、援外以及其他领域的建筑类型，得天独厚，有明显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 一专多用体育馆。体育馆兼有各种室内集会用途，特别是政治性集会，有一专多能的功效。体育馆本是富于表现力的建筑，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创新精神受到局限，艺术成就不及技术成果。如北京首都体育馆（1966～1968，张德沛、熊明设计），首次采用百米大跨空间网架，以及国内体育建筑的多项第一。其他如上海体育馆（1975，汪定增、魏敦山、洪碧荣等设计）、南京五台山体育馆（齐康等设计）、沈阳辽宁体育馆（1973～1975，陈式桐、王罗、刘芳敏设计）、郑州河南省体育馆（1967，黄新范、李舜华、王国修设计）等。

2. 外交热推外事新建筑。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日本首相田中访华以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国家数量的激增，对使领馆和涉外建筑设施提出大量需求。旅馆如新建北京饭店东楼（1974，张镈、成德兰设计）、北京16层装配式外交公寓（1971～1975）、北京国际俱乐部和友谊商店（1972，马国馨等设计）。使馆有北京伊朗驻华使馆，巴基斯坦、联邦德国、瑞典使馆等等。

3. 应运而生候机楼。国际交往的增多，使更多候机楼建筑应运而生。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杭州机场候机楼（1971，张细榜、黄琴坡等设计）从勘察设计到建成使用不到两个月。其他有乌鲁木齐机场候机楼（1972～1974，孙国城设计）等。

第三，地域性建筑。“文革”期间，全国实际形成一种无形割据和疏于管理的局面，为下放各地的建筑师留下了一线创作的缝隙。所谓地域性，有双层含义：一是建筑反映当地自然条件和风土人情；二是对国情有深刻理解，真实反映当时当地建设条件。这批建筑崇尚纯朴，毫不铺张，留下一个创业时代的谨慎和清新，其中两广建筑独秀。广州矿泉客舍（1972～1974，莫伯治、陈伟廉、李慧仁等设计），系改建、扩建原有仓库等建筑，并组织园林环境，使原来没有观赏价值的平淡地形成为具有自然魅力的场所。广州少年宫（1966，余峻南设计），利用旧建筑和极为普通的地方材料，把流水湖畔某化工厂破烂的遗址变成绿草如茵、内容丰富的科学园地。高层建筑也是广州建筑的成就之一，如白云宾馆（1973～1975，林克明、莫伯治设计）等，也融合了园林手法。广西南宁广西民族博物馆（1978，高磊明等设计）、南宁体育馆（1966）以及桂林的风景建筑芦笛岩接待室（1975，尚廓等设计），都是探索地域性和现代性建筑的典型实例。文革中地域性建筑，在没有创作口号的情况下，表露出一种真诚的现代美学气质。

五、初现特色，新时期之初的自发探求

改革开放初期，建筑创作中的物质条件和创作环境虽有改善，但依然比较落后。努力建设“四化”的口号，成为鼓励建筑师的强大思想动力，“适用、经济、美观”、“中而新”以及经典现代建筑原则，依然是一般建筑师自觉遵守的设计准则。建筑作品规模并不宏大，但创作紧密结合国情，深入生活，既有很强的功能性，又有鲜明的现代性，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建筑”的一次自发起步。我们可以看到：

1. 小型建筑起步，体现朴素的现代建筑原则。一批规模相当小的交通建筑，成为开路的先锋。交通建筑并无传统模式，功能性强，流线直接，不容虚饰。相应地，建筑平面简捷顺畅，形象朴实。如天津塘沽火车站（1975～1978，胡德君、张文忠等设计）、桂林火车站（1977，柳州铁路局勘测设计所设计）、昆明汽车客运站（1979～1983，云南省建筑设计院设计）、重庆白市驿机场航站楼（1984，布正伟，郑冀彤，张仁武设计）、辽阳火车站（1978，中国建筑东北设计院设计）、北京首都机场航站楼（1979，刘国昭、倪国元设计）等。建筑的现代化从小型建筑做起，是正确的起点，随着建筑规模的逐步扩大和经济效益的吸引，小型建筑被忽视了，小建筑的大作用淡漠了。

2. 立足现实国情，深入研究创造建筑新形象。建筑师立足于所在地域特点和项目具体条件，经过深入现场作调查研究得出建筑构思，不但体现了建筑的特异性，同时也体现了自由创造精神。像北京动物园爬虫馆（1975，张郁华等设计）、天津水上公园动物园熊猫馆（1976，彭一刚设计）、自贡恐龙博物馆（1983～1986，高士策、夏朗风、吴德富设计）、浙江缙云电影院（1983，葛如亮，龙永龄、钱锋设计）、沈阳新乐遗址展厅（1984，张庆荣、李慧娴设计）、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85，齐康、顾强国、郑嘉宁设计）、北京国际展览中心（1985，柴裴义、张天纯、林慧姬设计）、长沙湖南师范大学美术专业教学楼（1985，王绍俊、王胜平、邹仲康设计）、北京第四中学教学楼（1985～1987，黄汇、程玉珂、徐禹明设计）。如今，因取得资料的方便或周期的紧急，现场的调研被忽视了，这是难以获得原创建筑精神的原因之一。

3. 整体建筑语言，建筑艺术中的整体性观念。整体建筑语言造就建筑的完整统一，不但应用在总体布局和单体空间体量上，也体现在室内和细部设计之中。运用整体建筑语言，不仅是建筑手法的恢复，也是文化观念的恢复。如曲阜阙里宾舍（1985，戴念慈、傅秀蓉、杨建祥设计）、上海西郊宾馆睦如居（1985，魏志达、季康、方菊丽设计）、上海电影技术厂录音楼（1985，郭小苓、刘呈莺、徐之江设计）等建筑，将一种建筑艺术语言贯穿始终。今日的现实中，把半成品设计的空壳子交给装修公司去“装修”，难免出现一些与原设计语言矛盾的商业化现象。

4. 技术观合国情，低技术和适宜技术的应用。改革开放之初的创作环境中，尚缺乏先进的建筑技术和设备，所以常常沿用当时仅有的技术，甚至用所谓“土法”，以低技术或适宜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在许多建筑中体现了这一观念。如甘肃敦煌航站楼（1983～1985，刘纯翰等设计）、甘肃窑洞建筑（任震英设计）。“土法上马”曾是一种

短缺的无奈,如果以可持续发展观来衡量,正是多种技术并举的全面技术观。

六、地域建筑,繁荣建筑创作中的亮点

地域性建筑是中国建筑师久远关注的课题,它回应当地的自然条件,运用地方性材料和建造技术等,而且吸收当地建筑文化成就。1950~1970年代,地域建筑都有良好的表现,1980年代,又为建筑创作增添了光彩。十余年间,可以明显地看到几个比较活跃的建筑地区:

1. 福建:风景区大城市同时并举。不但在自然条件优美的风景区,同时在大城市也做出明显的成绩。如福建武夷山庄(1980~1983,齐康、赖聚奎等设计),体现武夷山“碧水丹山”的独特风貌并使用地方材料和当地民居的建筑做法。福州福建省图书馆(1989~1995,黄汉民、刘晓光、王小秋设计)和福州福建省画院(1990~1992,黄汉民、梁章旋、金华元),都是在适应城市环境,采用当地民居的建筑元素以及组织室内外融合的园林意趣而获得效果。

2. 江浙:主流地区的传统和现代。粉墙、黛瓦清丽纯朴的江浙民居,一直是江南主流建筑风情的标志。进入新时期以来,由模仿个别要素(马头墙、青瓦顶、漏窗等设计),发展到把握总体环境、加入现代气息。杭州花家山宾馆4号楼(1981,唐葆亨、方子晋、董孝纶设计)、无锡太湖饭店(1984~1986,钟训正、孙钟阳、王文卿设计)、无锡新疆石油工人太湖疗养院五号疗养楼(1985,卢济威、顾如珍、李顺满设计)、绍兴饭店(1987~1990,陈静观、谢永锦、龚景超设计)是典型实例。上海龙柏饭店(1980~1982,倪天增、张乾源、胡其昌设计)则体现了外来地域性建筑文化的脉络。

3. 川陕:民居是建筑风格的源泉。地域性建筑的许多特点都体现在民居中,有的建筑师提出民居是风格的源泉。仪陇朱德纪念馆(1982,杨星海、张文聪、孙嘉瑞设计)、四川九寨沟宾馆(1985~1988,赵擎夏、刘小明设计)、临潼华清宾舍(1978,洪青、孙巽、张伯伦设计),体现了这一主张。

4. 新疆:民族形式向地域性转换。如果说新疆地区1950年代的探索是以少数民族建筑形式符号为主,进入1980年代后,有向地域性转型的趋势。如吐鲁番招待所(1979~1980,王小东设计)拱结构屋面上覆以黄土,冬暖夏凉。吐鲁番宾馆新楼(1992~1993,刘谓设计),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迎宾馆(1985,高庆林、吴建业、申国宾、阳祖跃设计)、库车龟兹宾馆(1992~1993,王小东设计)等兼具地域性、现代性和人文特色。

5. 北方:延续旧城文脉有机更新。在北方,一是延续以北京四合院民居为代表的有机更新,如北京菊儿胡同住宅改造(1988~1990,吴良镛等设计);二是在建筑文脉比较清晰的地区,明显吸取地方特定地域建筑文脉。如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1985~1991,关肇邨、叶茂煦、郑金床等设计)、北京丰泽园饭庄(1994,崔恺、韩玉斌、周玲等设计),荣成北斗山庄(1990~1991,戴复东等设计)的海草屋顶、乱石墙面,地域建筑效果鲜明。

6. 景园：自传统出发创新出新意。园林建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是文革以后行动最快的建筑类型之一，大都是从传统园林建筑出发而出新的，如上海方塔园（1980～1981，冯纪忠设计）建筑巧妙运用钢结构现草顶竹构建筑，延续当地农舍文脉。杭州西湖阮公墩云水居（1982，卜昭辉等设计）用轻钢屋架、竹饰面。平度现河公园（1989～1994，彭一刚等设计）做多种屋顶变体，使建筑面貌一新。合肥环城公园（1983～1985，劳诚等设计）结合城市景园体系建设，从传统出发，运用现代材料设置景点改善城市的大环境。1980年代开始兴建的主题公园，起先以景园建筑思路布局，日后引进国外游乐设施转向游乐园，如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1990～1991，杨永祥、张敕、盛海涛、曹磊等设计）。另有对于古代名园、名楼的复原，也是这个时期景园建筑的成就之一，如黄鹤楼、岳阳楼等。

地域性建筑是我国建筑成就的重要侧面，但存在形式要素领先的倾向，如何结合生态等可持续发展的课题，是对建筑师的期待。

七、回归人本，从短缺起步的居住建筑

居住建筑问题，是最重要的民生问题之一，共和国成立之初，城市住宅数量缺乏，卫生条件极差，许多城市形成了环境恶劣的棚户贫民窟，所以，新建了许多工人新村，解决急需。根据当时全国50个城市人均居住面积3.6平方米的现状，制定每人居住面积4平方米的设计标准，实行了30余年。由于人口由“4万万”增至八亿的现实，消解了住宅数量的增长。同时，所谓“合理设计，不合理使用”的救急策略，形成几户合住与缺厨少厕的尴尬。至1970年代末，住宅的“欠账”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了。

1. 再起步回归人本

自1978年10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关于加快城市住宅建设的报告》，要求迅速解决职工住房紧张问题，到1985年，城市平均每人居住面积要达到5平方米^[2]。此后加快了住宅建设的进程。

（1）开拓投资渠道，促进数量增长。国家提出发挥国家、地方、企业、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建设住宅的方针后，1979～1984年六年间，逐步做到了住宅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旧账逐步还，新账不再欠，1984年全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增至4.77平方米^[3]。

（2）提商品新概念，调整住宅标准。邓小平在1980年4月2日谈话中指出：“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付清。”这些指导性意见，促进了住房制度的改革，使住宅建设开始走上商品化的轨道。1984年11月国家科委提出到2000年争取基本实现城镇居民每户有一套经济实惠的住宅，全国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8平方米的目标。

（3）从竞赛看转型，新概念之初现。设计竞赛是促进建筑创新的有效方法，1979年建设部恢复了中断了22年的设计竞赛，举行了“全国城市住宅设计方案竞赛”，首次

提出“住得下”、“分得开”与“住得稳”的要求。1984年的“全国砖混住宅新设想方案竞赛”，首次引入了套型系列与单元系列平面，已逐渐向现代生活靠拢。1987年建设部举办的“‘七五’城镇住宅设计方案竞赛”，是一次响应国际住房年的活动，以起居室为中心的“大厅小卧”式设计，得到普遍重视和应用。1989年的“全国首届城镇商品住宅设计竞赛”，“我心目中的家”成为创作核心。1991年进行了“全国‘八五’新住宅设计方案竞赛”，注重功能改善，由追求数量转为讲求质量，由粗放型向精细型转换。

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不但大大改善了居住条件，并从多个方向回归了人本精神。较早的实例如深圳园岭联合小区（1982）、无锡“支撑体”住宅（1983，鲍家声等设计）、天津低层高密度住宅（1979，胡德君设计）、北京台阶式花园住宅等。在一些大城市，过去已经萌芽的高层住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上海漕溪北路高层公寓（1970年代，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设计）、广州名雅园小区高层建筑等。

2. 试点小区开大路

1978~1985年，是住宅“量”的猛增阶段，也出现了规划、设计和施工偏于粗放的情况。1986年，建设部选择无锡沁园新村（1987~1988）、济南燕子山小区（1987~1989）、天津川府新村（1987~1989）可代表我国北方、南方及南北方过渡地区的三个小区，作为试验小区，并取得良好效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扩大试点，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与评定标准。自此，第三、第四、第五批全国城市住宅小区建设试点的工作展开。同时，各地方也相继进行了省级试点工作。有许多项目获奖，如合肥琥珀山庄南村、北京恩济里小区、上海康乐小区、常州红梅西村等优秀小区，更成为住宅建设的典范^[4]。

3. 从安居走向小康

1994年国务院提出了实施国家“安居工程”计划。安居工程既不是高标准的豪华住宅，也不是简易房，平均每套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左右，其平价住宅以建设成本价格向城市中低收入和住房困难户（人均居住面积在4平方米以下）出售。1995~1997年三年共有近245个城市被批准实施，建筑面积近5000万平方米。

19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概念，中共十六大将“小康社会”深化发展为“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两个阶段，并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目标。这一战略目标对小康住宅的研究和发展，指出了具体的方向。1994~2000年，各地有七批共70多个小康住宅示范小区设计通过审查进入实施，2000年后示范小区并入康居工程。2005年建设部表彰了通过国家康居示范工程78项，分布在23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4. 社会期待和谐人居

进入新世纪，住宅建设飞快发展，至2005年底，全国城镇住宅建筑面积107.69亿平方米，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6.11平方米，全国城镇户均住宅建筑面积83.2平方米，住宅成套率为80.64%^[5]，从数量上已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居住水平接近。但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如：

（1）住宅供需之间的错位，一方面住宅建设的数量远不能适应城镇人口的增长，另

一方面在住宅供应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全国城镇仍空置了上亿平方米商品房。

(2) 建设使用过程中费地、费能源、费水、费材和环境污染的现象严重,因为施工水平低下造成城市用水、大气、噪声以及低质建材等造成的环境污染,难以治理。

(3) 居住状况明显分化,高收入阶层购买一套或多套豪宅,中等收入阶层人购买环境较好的普通商品住宅,而低收入阶层和城市贫民的居住状况相对较差,加上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居住贫困化问题,已经影响到城市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6]。

(4) 市场房价控管不力,首先,市场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已经导致了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被压抑,他们急需住房,而市场提供的大部分是中高档住房。第二,因供需缺口和利润追逐,致使房价一涨再涨,低收入阶层无法实现安居,中收入阶层也因买房而成“房奴”。第三,住房改革和住房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对住房市场的管控不力,特别是对百姓最敏感房价问题。

中共十六大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解决住宅建设中所存在的种种不和谐现象指出方向,人们期待政府以科学发展观来探讨住宅的发展问题,这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路途尚远,人民期待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和谐人居前景。

八、超越经典,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创新

发源于欧美的经典现代建筑,先后以主动或被动的方式,在世界各地传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筑师对经典现代建筑及其二战之后的发展与修正进行了再认识,中国建筑作品,进入一个既逐渐融入国际又具中国特色的创作阶段。

1. 传统建筑类型的新表现。现代建筑有许多传统类型,新时期的优秀建筑,在功能性、科学性、经济性、真实性、空间化、理性化等方面,突破了原有建筑类型的设计水准,出现了新面貌。建筑类型不胜枚举,仅能略举一二。

体育建筑。通过亚运会和奥运会以及援外项目的促进,达到了新的水准,如国家奥林匹克中心的不断完善(1984~1999~2008),直到奥运会上所谓“鸟巢”、“水立方”的完美展现;上海、广州、天津、长春、哈尔滨、大连等地完成的体育场馆,都有独特表现。

交通建筑。经济发展的新需求,促使火车站和航站楼等交通建筑类型之规模、品质有了本质的飞跃,如首都机场航站楼的一扩再扩(T1-1980, T2-1999, T3-2009)满足了奥运会繁重的迎送任务;其他航站楼如广州白云机场,重庆江北机场,大连、济南、珠海、乌鲁木齐机场,拉萨贡嘎机场、贵阳龙洞堡机场等,各有突破;新火车站遍及各地,而且许多采用了“线上”式的结构。早期如天津铁路新客站(1988, 2008, 韩学诨等设计)、沈阳北站综合楼(1987~1990, 徐方等设计)、杭州铁路新客站(1991~1999, 程泰宁等设计)、北京西客站(1996)等,各具特色。

科教建筑。是以往比较薄弱的建筑类型,教育和科研的大力推进,使科教建筑得到

相应发展,其设计有集教学、科研和服务于一体综合化趋势。香港著名人士邵逸夫、包玉刚等人,大量捐赠内地教育事业,在许多学校中建起以他们命名的科教建筑,如广州华南理工大学逸夫科学馆(1992,何镜堂等设计)、上海同济大学逸夫楼(1993,吴庐生等设计)、重庆大学图书馆及学术中心(1992,王辉、关肇邨、余吉辉等设计)、武汉大学人文科学馆(1987~1990,沈国尧、高崧、孙明伟等设计)。近些年来,各地兴建“大学城”,尽管对此类“圈地”现象有所批评,但客观上也建成了一批规模较大、设施完备、形象清新的校园,像沈阳建筑大学等等。另外,各个省会城市,先后都建设了较大规模的图书馆,亦为科教建筑之盛事。北京国家图书馆二期和上海图书馆(1996,张皆正、唐玉恩设计)等,代表了新的水准。

博览建筑。新时期的博览建筑,如博物馆、展览馆等,有全新的表现,不但已具有现代化设施和综合性功能,而且表现出结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1986~1993,莫伯治、何镜堂等设计)、北京炎黄艺术馆(1988~1991,刘力等设计)、上海博物馆(1995,邢同和等设计)、郑州河南博物院(1992~1997,齐康设计)、拉萨西藏博物馆等(1999,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设计)。大型展览馆如北京国际展览中心(1985~,柴裴义等设计)、新疆国际博览中心新馆(1994~1995,孟昭礼、孙国城等设计)。

高层建筑。集现代建筑各项进步为一体,如先进的结构设计和计算技术,高强的建筑材料、较高的施工技术,复杂的建筑设备,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等等,所以许多人认为高层建筑是现代化象征。1980年代,高层建筑分布在有限的几个大城市之中,如深圳、广州、北京等地。此后,建筑规模和高度日新月异,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已达460米,更高的建筑还在建设之中。毋庸置疑,众多超高层建筑是外国建筑师的设计,其中先进技术和设计思想乃至设计管理,值得中国建筑师学习和借鉴。

工业建筑。工业建筑已经摆脱了“肥梁、胖柱、深基础”的苏联工业建筑体系。高科技的发展,科技园的建立,出现了许多新型的工业建筑,如多高层厂房、通用灵活车间、洁净和超净的封闭车间、新型科学试验建筑、核电站、现代藏书仓储建筑等等;同时,全球环保意识加强,不但满足环保的要求,而且使工厂园林化。较早的项目如成都全兴酒厂(1991,黎佗芬等设计)、大连华录电子有限公司(1992~1993,黄星元、周景溪设计)等。与飞机制造业和民航有关的大型厂房和附属设施,因其大跨结构和先进设备而格外引人注目,如北京四机位机库以及北京航空港配餐中心(BAIK),天津A320空客总装厂房等。

2. 建筑环境意识的新觉醒。虽然真正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建筑尚待时日,但环境意识已经渐入人心,不乏尊重周围自然环境并注意与之相协调的优秀作品,如黄山云谷山庄(1987,汪国瑜等设计)、织金洞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接待厅(1990~1992,罗德启等设计)、深圳大学会演中心(1987~1988,梁鸿文等设计)。虽然这些作品所反映的环境意识,并没上升到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层次,但从中可以明确地体会到朴素的、基于建筑本体要素的、适应自然的设计思想,无疑会发展成为积极主动的环境保护建筑理念。

3. 建筑创作文化观的重建。建筑作为文化现象，不言而喻。文革“砸烂”了建筑传统，革掉了文化内涵，所以1980年代有一个重建文化观的普遍浪潮。反映在建筑创作方面，一是主流传统的新续，出现颇具现代性的古典建筑形式，如西安“三唐”工程（张锦秋设计）和曲阜阙里宾舍（戴念慈设计）为代表的一批作品；二是在建筑中注入或保持文化内涵，如清华图书馆（关肇邨设计）、曲阜孔子研究院（1996~1999，吴良镛等设计）、天津大学建筑系馆（1987~1990，彭一刚等设计）、淮安周恩来纪念馆（1989~1990，齐康等设计）。三是所谓“通俗文化”进入建筑，这类作品曾以所谓“后现代”建筑的部分特征而立足于世。在许多“一条街”的建设中出现此类建筑，引起一些关于“雅”“俗”问题的讨论。

4. 基于本体的象征与隐喻。建筑创作之多元化局面，其明显的一枝是象征与隐喻。象征与隐喻是文学艺术领域的创作手法，一般说来建筑艺术并不善长此道，建筑师需把握喻体和本体之间的“象形度”，过像会伤及建筑本性，过远则难以形成联想。新时期的创作有许多良好的实例，如威海甲午海战馆（1994~1996，彭一刚设计）残缺船体，沈阳“九一八”事变陈列馆（1991，赵永丰、贺中令设计）的国耻日历，东莞游泳馆（1993，余兆宋、李小莉等设计）的鱼跃，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中心（1986~1990，周儒等设计）的“聚宝盆”等等。

近30年的建筑创作，深化并超越了经典现代建筑的历史局限，走向了“中国特色”建筑之路。所谓“中国特色”，是一个永远向往的理想，当我们停下来审视至今的建筑成就时，它就是一个自然的现实。

九、出去进来，从援外到国际建筑市场

1. 援外建筑另辟蹊径

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中国建筑断绝了与欧美建筑的直接联系，仅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有些来往，一五计划期间苏联等国对我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同时，政府也向“兄弟国家”或“友好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并视之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重要内容。1956年，政府决定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提供1.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帮助兴建14个成套项目，中国建筑师在国外的建筑活动也就在“援外工程”中起步。如龚德顺主持的乌兰巴托百货大楼、乔巴山国际宾馆、高级小住宅及政府大厦扩建工程等，与国内情况不同，均具有现代建筑的典型艺术特征，也很好地适应了他国的需要。与此同时还开始了对越南、柬埔寨、朝鲜、尼泊尔、也门、阿尔巴尼亚等国的经援项目。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外交上的成功、国际关系的改善，也使援外达到高峰。援外项目在48个国家里达到213个，形成项目分布广、类型多的局面。

体育建筑是援外建筑成就突出的建筑门类，为表彰中国援外的体育建筑，国际奥委会曾颁发奖杯给中国政府，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赞扬说，要看中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来。在体育建筑的设计中，建筑师做到了能适应不同国家的不同要求，例如叙

利亚体育馆,要求兼有会堂和宴会厅等。其他如塞内加尔友谊体育场(1975~1985)、塞拉利昂西亚卡·史蒂文斯体育场(1979)等,也是这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

会堂和观演建筑是援外项目的又一大类,这类建筑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表现当地建筑文化、尊重当地民族情感以及借助当地传统建筑手法或构件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如斯里兰卡国际会议大厦(1964~1973,戴念慈等设计)、几内亚人民宫(1967,陈登鳌设计)、苏丹友谊厅(1976,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设计)、扎伊尔人民宫(1979,林开武、单沛圻设计)、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国际会议大厦(1979,陈登鳌设计)等。

此外,还有文化教育、办公、医疗、展览等其他公共建筑类型。例如阿尔及利亚展览馆(1960年代)、毛里塔尼亚青年之家(1970,刘福顺设计)、毛里塔尼亚文化之家(1971,刘福顺设计)、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塔伊兹革命综合医院(1975,陈嵩林、李全卿设计)、索马里摩加迪沙妇产科医院(1977,杜岩设计)、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火车站(1975)等。

2. 在竞争中释放个性

1980年以来,对外经援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彻底避免了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弊端。建筑创作的国内和国际竞争机制,促成一批中青年建筑师优秀作品脱颖而出。

突尼斯青年之家(1990)是刘力在1985年全国公开招标中获胜作品,环境、建筑、室内一气呵成;加纳国家剧院(1985~1992)是程泰宁在1986年全国性招标中胜出作品,剧院视听俱佳、体量奔放、细部精致。他设计的马里会议大厦(1989~1995),借景尼日尔河并传达当地伊斯兰建筑的韵味;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中心(1983~1986,魏敦山等设计)的作者获得埃及总统授予“国家一级军事勋章”;瓦努阿图会议大厦(1991,王天锡设计)、受当地传统民居启发,轮廓别致、色彩鲜明。此外,继续发扬体育馆建筑的优势,建筑作品进入更高境界,如巴基斯坦体育综合设施之体育馆(1985,梁应添等设计),贝宁科托努体育中心之体育馆(1980年代,项祖荃等设计),肯尼亚国家体育综合设施之体育场(1987,黎佗芬等设计),体育馆(1989,周方中等设计)。

应当看到,这些建筑反映了国内建筑师、建筑材料、技术和设备的整体较高水平。但是,中国建筑师进入国外市场的势头,远远不及外国建筑师占据我国建筑市场的猛烈,现在已是真正进行国际竞争的时刻了。

3. 外来建筑的新经验

1949年后在中国大地上重见外国建筑师的新建筑作品,是1980年代之初。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作品香山饭店(1979~1982),以江南园林的情思、中国建筑传统的再探以及昂贵的建筑造价,引起中国建筑师的热烈争论;美籍华裔建筑师陈宣远的北京建国饭店,以其高效、务实和民居气息,展示了美国建筑实用主义的性格;北京长城饭店(1979~1983,培盖特事务所设计)是中国第一批出现的玻璃幕墙建筑,而南京金陵饭店(1980~1983,香港巴玛丹拿公司设计)以110.9米的高度抢占最繁华的新街口广场,凸显了城市规划面对来势凶猛的外来建筑,尚缺乏应有的准备。

更重要的是,以“合作”名义进来的外来建筑,的确带来我国建筑缺少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建筑创作的水准。

(1) 超高层建筑表现出强大建筑技术和设备支持,形象干净、精细,与一些体量变化多端、顶部五华八门的国内设计形成对照;

(2) 外国建筑师显示了对功能、技术复杂的大型或超大型公共建筑的丰富经验。如大型机场、航站楼,高水准的大剧院或商业建筑等。如上海大剧院(1997,夏邦杰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

(3) 许多外国建筑师或因尊重中国建筑传统以博取中方的好感,力图在自己的作品中,贯彻某些中国传统的因素,如上海商城(1990,波特曼设计)、金茂大厦(1992, SOM 设计)等。

(4) 外来的经验超越形式,尽管对外来建筑的观察依然是建筑形式首当其冲,但形式背后的深层含义和设计事务的经验,已经超越形式,而多数设计并非风格或流派挂帅。

4. 明星建筑师的商业表演

越来越多的外国建筑师参与一些大城市重大建筑的竞标活动,并有屡战屡胜之势,最令人瞩目的是北京国家大剧院、CCTV 新厦、北京奥运工程的“鸟巢”、“水立方”等建筑方案。外国建筑师具有较高的设计水准和足够的特色,但也应当看到,其迎合业主猎奇心理的商业语言。外来建筑师,善于用商业营销手段“包装”设计产品。例如为产品起个动人的名字“天鹅”、“风帆”、“鸟巢”之类。同时,他们还用一些似是而非甚至强词夺理的所谓“理论”,论证方案的正确。例如 P. 安德鲁解释国家大剧院与传统的关系时说:“我认为保护一种文化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把它置于危险境地。”^[7]而大都会建筑事务所解释 CCTV 设计的新总部大楼时说:“超高层大厦是最忠实遵循经济原理的类型之一……只能依靠某种具有直感的想象力来对抗其原理,孕育新的东西。”“这一建筑也许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但是,确实只有中国人才能建造。”^[8]有时,外方把话筒交给中方合作者,期望他们的代言更能从文化心理上打动中国评选团和受众,避免了外来话语的霸气。

人们期望明星建筑师在解决当前社会发展问题上,在实践可持续发展的议题上做出榜样,从中实现自己的商业价值,而不是冠冕堂皇地为业主增添负担。

十、理论探新,从风格讨论到北京宣言

建筑创作的思想、方法,涉及到对自然、人本、社会、科技等等多种问题的思辨,甚至有些哲学式的思考,中国建筑师有这方面的良好传统。“一五”计划初期,苏联专家照他们本土的文艺斗争经历,在我国建筑界推行那两个口号并追讨所谓“结构主义”(即构成主义),造成理论的困惑和紊乱。

建国 10 周年,迎来了有自主话语权的建筑理论现象:建筑学术界摆脱了“大跃进”的浮躁氛围,恪守研究工作的基本信念和方法,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力编写完